

国内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三十年：文献综述与未来展望

孙奕峰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4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19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29日

摘要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的重要命题。本文利用分析软件CiteSpace，以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为基础，对1994~2024年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444篇北大核心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包括发文量趋势分析、最高被引量分析、关键词总体分析、发文时区分析等。此外，本文从结构论和发展论两大层面系统梳理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三十年的重要成果和发展局限，并力图阐述未来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文献综述，未来展望

Thirty Years of Research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Chin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Yifeng S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April 14, 2026; accepted: June 19,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Abstrac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s a key pro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and, based on visual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 conducts a visual analysis of 444 Peking University core journal article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dex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from 1994 to 2024. The analyses include trends in publication volume, most highly cited articles, overall keyword analysis, and timezone analysis of publication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al limitations of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al theory and developmental theory, and seeks to identify potential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Literature Review, Future Prospec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是跨文化交际学的重要课题。笔者目前可检索到的最早的明确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论文是杭国生(1994)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法德语教学》[1],可见国内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已有三十年。三十年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内该领域研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和丰硕成果,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逐渐成熟,充分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效能。但不可否认,其也存在视野的局限和方法的瓶颈。总的来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厚的发掘潜力,是充满时代底蕴、现实关照和人文关怀的新兴领域。

当前,世界正处于巨大变动中,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跨文化交际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个体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驱动因素。位于新的历史坐标、置身新的实践语境、面对新的时代际遇,我们完全有必要对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成果、理论边界和未至之境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以期推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指明未来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演进方向,增强促进跨文化交际实践的理论动能。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三十年取得了什么样的理论成果,形成了怎样的研究格局?第二,当前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有何局限和瓶颈?第三,如何基于三十年的历史沉淀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开辟研究新境界?

本文研究综述只是针对期刊论文,并未将专著和博士论文等考虑在内。

2. 研究现状

2.1. 研究概况

数据的采集和筛选

登录“中国知网”,在检索中设置“主题 =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来源类别中勾选“北大核心”,之后在其数据库中经初步检索,共得到期刊论文 542 篇。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有效性,我们进行人工过滤杂质,最终得到可用于可视化分析的有效文献数据 444 篇(图 1)。在每篇文献中均包含有作者、篇名、研究机构、登载期刊、发表日期、关键词、摘要等具体信息。笔者将所有文献使用知网中的 RefWorks 格式导出相关论文,导出文档类型为 TXT 文本,将导出的文本放入 CiteSpace 中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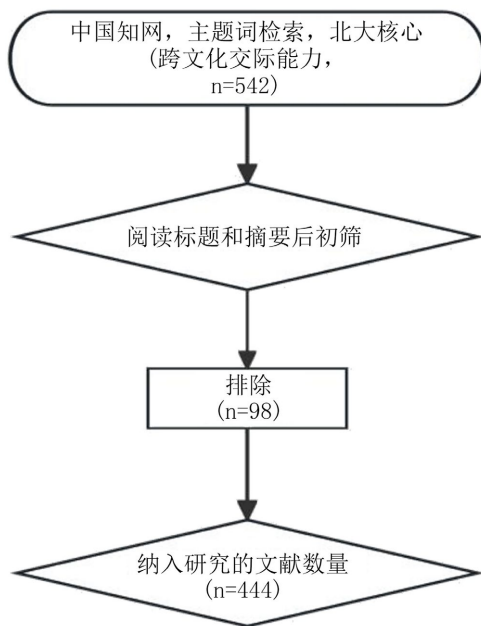


Figure 1. Flowchart of the literature search
图 1. 文献检索图

2.2. 数据可视化分析

文献时空分布特征

1) 文献时间分布特征

发文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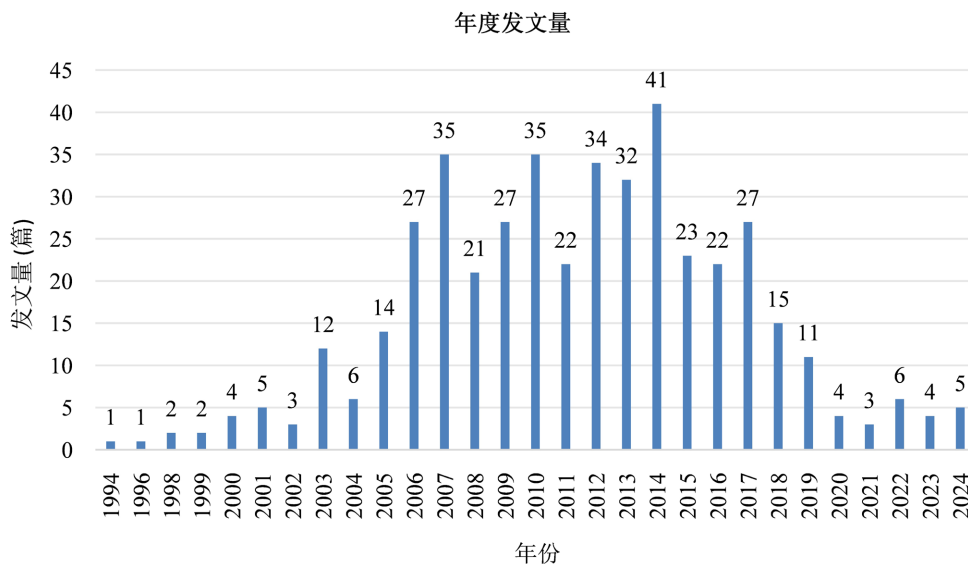


Figure 2. Number of publications(1994~2024)
图 2. 年度发文量(1994~2024)

2) 文献空间分布特征

(1) 期刊分布情况

我们统计了排名前十的期刊，结果如表 1:

Table 1. Table of top 10 core journals by publication count
表 1. 发文量前十的核心期刊统计表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
《中国成人教育》	36
《外语界》	27
《教育与职业》	26
《黑龙江高教研究》	15
《教育探索》	14
《电影文学》	13
《外国语文》	12
《教学与管理》	10
《外语与外语教学》	10
《语文建设》	10

绝大多数期刊均与教育密切相关，其中《中国成人教育》《外语界》《教育与职业》成为该领域的热门期刊。

(2) 机构网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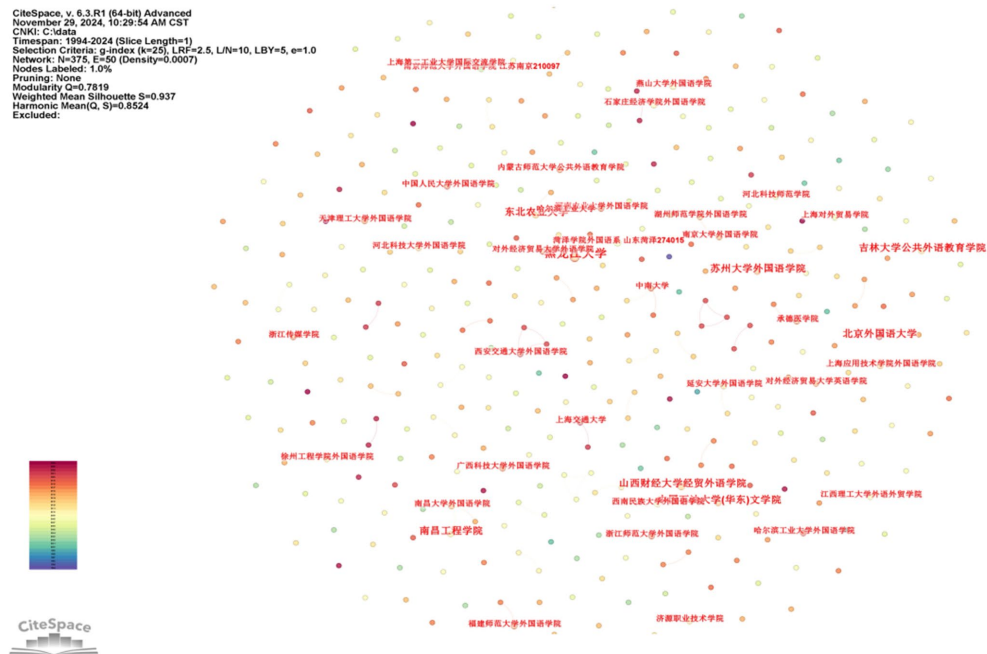


Figure 3. Institu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3.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机构分布

从发文机构上看(图 3)，外国语学院成为稳定产出的学术机构，这说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与外语教学紧密的相关性。

3) 高引文献分析

文献的被引频次是学术成果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探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成果的被引情况(时间截止 2024 年 11 月 13 日),我们选取了排名前 20 的文章,见表 2。我们发现:第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高被引文献多出现在新世纪初,且集中于《外语界》《外语与外语教学研究》两本期刊,这表明这两本期刊在该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第二,由来源期刊易见,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始于外语教学领域,是从外语教学过程中脱胎出的实践性问题;第三,高引文献都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构和培养有关,这表明“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该领域的两大基本问题,理论界具有充沛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意识;第四,20 篇高引论文中,10 篇文献是 2010 年后发表,这表明近些年来关于该领域的文献质量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成果初现。

Table 2. Top 20 highly cited publication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search

表 2.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20 篇高被引文献

序号	文章名称	作者	年(期)	来源期刊	被引频次
1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	高一虹	2002(10)	《外语与外语教学》	987
2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	胡文仲	2013(06)	《外语界》	749
3	构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	杨盈、庄恩平	2007(04)	《外语界》	690
4	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	许力生	2000(07)	《外语与外语教学》	499
5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	高永晨	2006(11)	《外语与外语教学》	431
6	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	刘学惠	2003(01)	《外语与外语教学》	374
7	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再认识	张友平	2003(03)	《外语界》	328
8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	葛春萍、王守仁	2016(02)	《外语与外语教学》	300
9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	高永晨	2014(04)	《外语界》	276
10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	孔德亮、栾述文	2012(02)	《外语界》	273
11	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的构建——基于外语教育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	张卫东、杨莉	2012(02)	《外语界》	269
12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价值与培养	高永晨	2005(12)	《外语与外语教学》	239
13	跨文化教学策略研究	林娟娟	2006(04)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7
14	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之理论和实践模型	顾晓乐	2017(01)	《外语界》	196
15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构建的先导研究	钟华、白谦慧等	2013(03)	《外语界》	191
16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调查	胡艳	2011(03)	《外语界》	174
17	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华厚坤	2003(06)	《黑龙江高教研究》	169
18	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	彭世勇	2006(01)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54
19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	高永晨	2016(02)	《外语与外语教学》	150
20	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现状与思考——以高校英语教师为考察维度	韩晓蕙	2014(03)	《外语学刊》	150

2.3. 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1)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的概括，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趋向以及各研究主题的关系[2]。针对有效文献，运用 cite space 进行高频关键词分析，最终生成 301 个节点，325 条连线，节点密度为 0.0072，形成的 1994~2024 年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在该图中，我们采用年轮形式呈现不同的节点。年轮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可以发现，“外语教学”、“交际能力”、“英语教学”、“跨文化”、“文化差异”为五大关键词节点，占据文献集合的核心位置，同时围绕他们产生了十分广泛的辐射状连线，形成了复杂的结构网络，主要连接了“能力培养”、“课堂教学”、“大学生”、“交际”等等，这说明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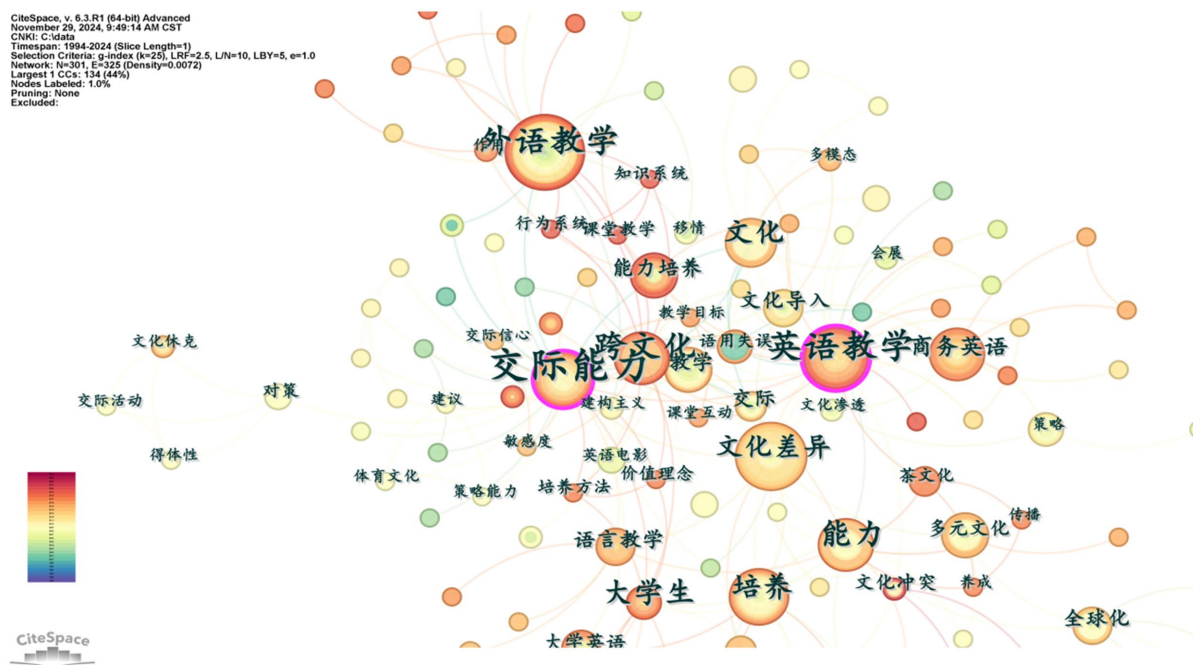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4.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2)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运用 cite space 进行关键词聚类，将关键词中具有明显相同特征的词汇作为聚类对象，可得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5)。如图 6、图 7 所示，形成了五组关键词聚类，分别是#0 英语教学、#1 交际能力、#2 大学英语、#3 商务英语、#4 外语教学、#5 能力。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主要阵地是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3) 关键词突现图与时区图分析

针对研究对象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包括突现关键词、突现强度和起止时间)和时区分析，能够清晰呈现该研究领域的历史沿革[3]。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问题贯穿三十年全过程；第二，学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伴随着语用失误这一交际问题；第三，近些年，学界出现了以“茶文化”为例展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第四，2007 年开始，跨文化意识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第五，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主要还是围绕外语教学中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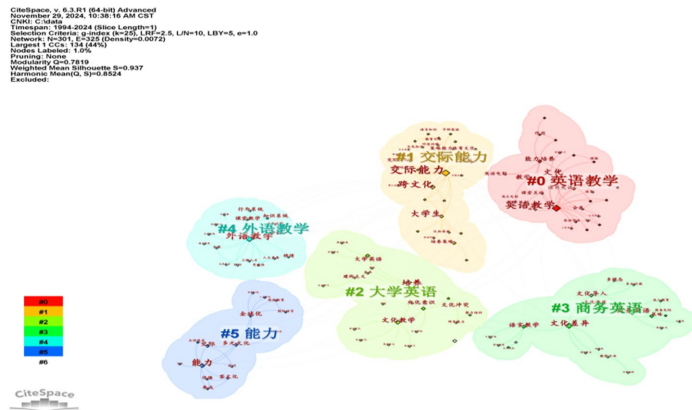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5.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Top 14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1994 - 2024
交际能力	2000	3.64	2000	2003	[Red bar]
语用失误	2000	1.97	2000	2001	[Red bar]
全球化	2005	1.7	2005	2009	[Red bar]
文化导入	2005	1.45	2005	2007	[Red bar]
文化意识	2007	2.35	2007	2009	[Red bar]
策略	2007	1.52	2007	2008	[Red bar]
文化	2000	1.68	2010	2010	[Red bar]
文化差异	2004	2.98	2011	2013	[Red bar]
培养策略	2007	1.39	2011	2016	[Red bar]
跨文化	2000	2.88	2012	2014	[Red bar]
语言教学	2012	1.91	2012	2016	[Red bar]
教学方法	2014	1.83	2014	2014	[Red bar]
能力培养	2007	1.41	2015	2019	[Red bar]
茶文化	2017	1.87	2017	2017	[Red bar]

Figure 6. Keyword burst map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6.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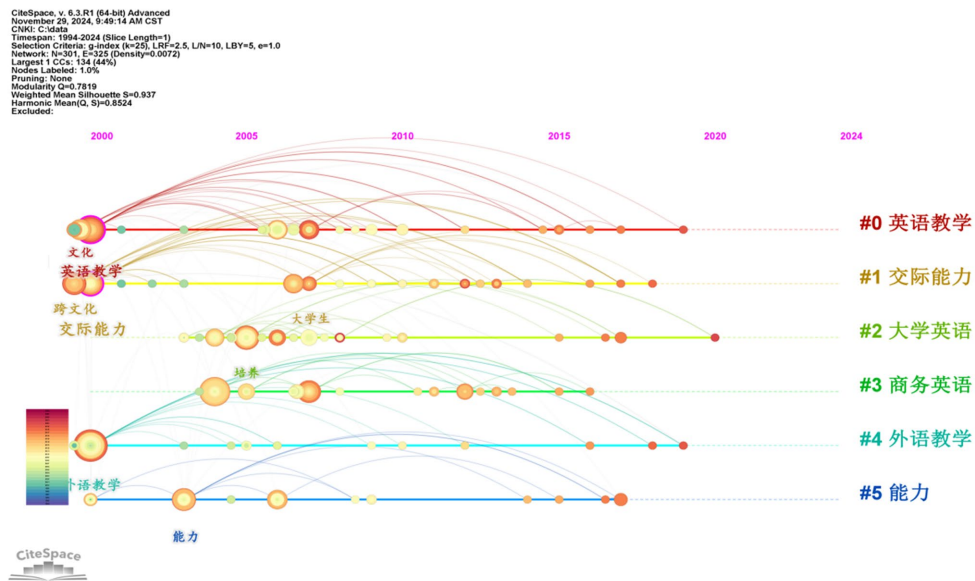


Figure 7. Keyword timezone map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search
图 7.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领域关键词时区图

3.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构论和发展论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归根到底就是两个基本课题,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问题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发展问题,我们分别将其称为“结构论”和“发展论”。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围绕这两个基本课题展开,其他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都是由这两个基本课题衍生而来。因此我们认为,梳理理论界对于基本课题的回答,就能够把握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发展阶段,就能够看清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未至之境和未来走向。

3.1.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和结构

中国理论界充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构进行了本土化定义和设计。杨盈、庄恩平(2007)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由全球意识、知识、文化调适和交际实践构成,并论述了四大能力要素的内在关系[4]。许力生(2000)基于 Canale 和 Swain 的划分标准,将能力构成分为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并特别强调语法能力和策略能力的重要地位[5]。刘学惠基于建构主义,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性,认为该能力是知识向度、思维向度、行为向度和情感和个性向度的统一体,并简要概括了各个向度的能力[6]。张卫东、杨莉(2012)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分为三个维度:文化知识、文化知识和交际实践,共包含 13 个因素,其中在交际实践方面,其强调交际策略和技能 and “利用外语得体交流”的重要性[7]。此外,潘晓慧(1996)、钟华(2013)、顾晓乐(2017)、柳超健(2018)、徐佳(2018)、袁靖(2021)、李琼(2024)等其他学者均深入探究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

总的来看,学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的研究具有以下共性:第一,坚持系统思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向度划分上基本达成共识,知识、技能和意识三维度划分在不同学者的观点中均可得到体现,只是表述和名称不同。我们认为这种划分维度应当是受到 Kim (1991)、Gudykunst (1992)等人的影响,其强调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尺度划分;第二,知识维度的具体要素上学界看法大同小异,都囊括了本国/他国文化知识,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等等;第三,在技能层面上,多数学者借鉴了 Canale 和 Swain 的观点,即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至少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8]。但国内理论界没有完全照搬二者的解释框架,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例如,高永晨(2005)强调了文化移情能力,并认为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内容[9];顾晓乐(2017)还突出了基本认知能力、高级批判思维能力和调适能力等等[10];第四,在意识层面,学界大都认同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强调文明平等、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和尊重他国文化;第五,结构论和发展论的并论。正所谓“不为实践服务的理论毫无现实意义”。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在探讨能力构成时,总是或多或少地谈及培养模式或策略,反之同理。结构论和发展论总是结合或纠缠在一起,没有绝对的界限。这是大多数文献显现出的共性。这反映出中国学者的实践意识和现实精神,体现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范式的内在逻辑。

三十年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构论研究成就概括地说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借鉴吸收了西方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体现了中国学界兼容并包的禀性和海纳百川的胸襟。许多西方学者如 Spitzberg、Cupach、Byram、Canale、Swain 和 Lustig 的观点在概念解释和框架设计上对中国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Spitzberg 与 Cupach (1984)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三要素(动机、知识和技能)理论[11]。Kim (2001)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因素概括为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行为因素[12]。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引介和吸收了西方理论的精华,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百家争鸣,理论纷出,基本完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本土化任务。正如胡文仲(2013)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本来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13]。三十年来,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构问题的回答不下数十种。许多学者提出了新框架新范畴,例如,高永晨(2014)建构了知行合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系统,其中“知”是知识、意识和思辨,“行”是态度、技能和策略[14]。袁靖(2021)将跨文化交际能

力分为跨文化知识和意识、跨文化性格与态度和跨文化思维和行为技能，并出现了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感、创新和创造能力等新要素[15]。总的来看，中国学者提出的各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构解释已经实现了对西方原有理论的超越，这宣告跨文化交际能力结构概念的本土化任务基本完成。后续的结构研究主要借鉴的是中国学者的概念范畴和话语资源。

第三，实现了从结构论发展论并重向发展论为重心的转型与飞跃，这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成熟和阶段过渡的重要标志。我们发现三十年间问题意识和实用主义取向占据主导地位，在文献上反映为发展论在数量上一直处于主流地位，是学界关注的重心，但是不能因此忽略结构论研究曾经是一股重要的研究潮流。我们以五年为一自然阶段进行划分，统计每五年间结构论方面文献的数量，结果如表3。

Table 3. Five-year publication count table for literature on structural theory

表 3. 每五年结构论方面文献数量统计表

时间阶段	结构论方面文献数量
1994~1999	3
1999~2004	7
2004~2009	9
2009~2014	8
2014~2019	9
2019~2024	4

我们发现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结构的讨论经历了由高潮到退潮的过程，这表明关于结构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成熟，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实现了从结构论和发展论并重向发展论重心的转移，学界的创新成果主要集中在发展论方面，即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上。从研究逻辑上说，结构论回答的是“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论回答的是“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是就三十年研究史看，发展论的回答先行于结构论，正如胡文仲所说：“从论文的题目和内容来看，一般性讨论较多，涉及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论文较多，而对于概念和理论的探讨较少[13]。”结构论研究的滞后性导致了发展论的早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论的研究。但是随着结构论研究的深入，其逐渐走向多元与成熟，这释放了发展论的研究潜力和理论空间，最终使得发展论研究不可逆转地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流和主要创新源点。

3.2.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这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我们称之为“发展论”。该课题下辖两个问题，即“培养哪类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显然，后者最能代表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三十年的发展成果。我们首先梳理以下前者，即学界研究了哪些能力发展对象。

纵览三十年研究史，“跨文化交际能力”最初的培养对象是高校学生，这符合前文所说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起源于外语教学领域”的逻辑前提。因此，针对高校学生的能力发展策略和模式研究最为充分，例如李映(2002)、高永晨(2006)、孔德亮(2012)、杨静(2013)、韩晓蕙(2014)、王济军(2014)、葛春萍(2016)等学者均以高校大学生为发展对象论述了培养策略。

虽然高校大学生是最主要的能力发展对象，但是不少学者探究了其他类型对象的能力培养模式。例如，颜静兰(2014)以外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提出外语教师要针对性地进行“补缺”和“补漏[16]”；毛菊(2017)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育问题[17]，颇具创新性；任晓霏(2018)探

讨论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18];杜秋枝(2019)指出了培养和提升公务人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途径[19];崔永华(2020)强调对外汉语教学以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20]等等。

总的来看,在“培养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的回答上,学界研究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以高校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共同作用使然。从研究史来看,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是从高校外语教学过程中逐渐分离和独立出来的,研究该问题的学者多是来自教学一线的学者。从教育理论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本质上是教育学问题,其最初的理论支撑是高等教育学理论;从实践看,高校外语教学过程中沉淀的实践经验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提供丰富滋养。因此,我们认为高校学生成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具有深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渊源。第二,其他类型对象的能力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探讨。这是发展论研究视野扩展和纵深发展的表征。依前所述,外国留学生、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等新的类型对象纳入学界讨论范畴。这表明学者们注意到了对研究对象变量重新赋值之后,相应培养策略发生的显著变化。这无疑丰富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理论模式。

前面我们简要交代了能力发展对象的研究现状,现对三十年来理论界在培养策略或模式取得的研究成果展开系统论述。根据模式的运行特征,我们将其总结为以下一种主流培养模式,即教育要素建构模式、“教师-学生-实践”三角模式、教学中心模式和主体共建模式。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空间模式等等。我们重点介绍教育要素建构模式、“教师-学生-实践”三角模式和教学中心模式。其他的模式类型我们简要概述。

教育要素建构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围绕不同教育要素如教材、教师、课堂、学生、理念、评价等展开,通过要素间的并举、联合和互动形成有机整体,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服务。柳超健(2018)、贾梦珊(2016)、李艳(2013)、尹立颖(2013)、李睿(2013)、葛春萍(2016)、蒋瑾(2013)、张敬(2010)等学者提出的培养模式都属于此类。例如,柳超健(2018)提出了跨文化商务课程体系的建立、能力培养融于隐喻文化教学的理念、将“词块”概念贯穿于教学设计的方法、“双师型”队伍建设等实践路径,建构了针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21];贾梦珊(2016)围绕教师、教学方法、课程和课外活动四要素建构了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22]。总的来看,此类模式建构充分体现系统论的思想,凸显不同要素联合发力的总体特征,得到学界充分认可。

“教师-学生-实践”三角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以提高教师能力、学生自我发展和参与交际实践为三个基本着力点建构培养模式。李琼(2024)、沈洪木(2017)、郭乃照(2014)、李智(2014)、李舒(2012)等学者提出的培养模式属于此类。李琼(2024)提出提高教师队伍的跨文化交际水平、学生打牢跨文化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创设跨文化交际实践机会三大举措[23],是针对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跨文化交际实践能力培养的积极探索;沈洪木(2017)从教师课堂导入,学生反思跨文化体验、在课堂教学中开展情景剧展演的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24];李智(2014)从学生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意识、建构课程体系和坚持实践取向三方面提出了当代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25]。总的看来,该教学模式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在实践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强调知识、拘泥课堂的培养理念。

教学中心模式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将师生等其他要素融入进来;以教学改革为动力,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吕丽盼(2021)、崔永华(2020)、姜培培(2019)等学者提出的培养模式属于该类。例如,吕丽盼(2021)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建设探讨外语教学如何培养新世纪跨文化交际人才[26]。崔永华(2020)强调通过重构汉语教学的基本思路、研制教学大纲和设计教学途径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20]。该教学模式的显著优势是聚焦教学本身,学理的深刻性强。

主体共建模式强调主体的能动性,通过不同主体合作共谋,实现能力培养的目的。例如,周广艺(2018)认为政府、教育机构和企业等主体要重视培养“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27]。张春海、成

丽宁(2020)认为从教师、院校和政府三方共同推动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28]。“第三空间模式”是顾晓乐(2019)提出的,其借鉴了“第三空间”理论并将其移植到跨文化外语教学领域,建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模式的科学性和实用性[29]。因此,我们将之单列为一种,以凸显其创新意义。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将数百种教学策略简单归结为几种模式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因而我们不追求这种机械性的划分,在这里只是进行了粗浅的概括。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当前的培养模式的研究格局,那就是以教育要素建构模式、“教师-学生-实践”三角模式和教学中心模式为主流,其他类型模式竞相涌现和发展的多元格局。

三十年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论研究成果概括地说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形成了以高校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他对象受到关注的总体视野。这体现出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张;第二,建构了能力培养的多元实践模式。前文我们总结了三种代表性的培养模式,这些模式都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第三,总结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的专著竞相涌现^①。笔者简要列举一些,见下表4。

Table 4. List of monograph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search
表 4.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专著列举表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融合途径研究》	袁婷、牛晓莉、黄婧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3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融合研究》	王静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2
《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孙鹤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1
《汉语国际教育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杨晶佩宜、李晓洁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3
《外语跨文化教学研究》	李睿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22
《跨文化视域下的当代英语教学新探》	陈玮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0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高校日语教学策略探究》	孟红森	吉林出版集团	2021
《“汉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教学研究》	刘家思、孙永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1

这些专著既是对过去理论研究的大总结,也是在实践中凝练和升华的策略体系,代表了三十年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成果。

4.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方法体系、未至之境和未来展望

本部分,我们系统回答学界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问题。此外,我们回顾文献,力图归纳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

4.1.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方法体系

定性方法为主,定量方法为辅。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众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是定性和定量两大方法。当前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方法以前者为主,注重逻辑分析推理和理论的体系化建构。

形成“概念解释-现状铺陈-主体论述”的理论思辨链条。就目前文献来看,其内在逻辑结构都是先解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概念,再列举性地说明当前的研究现状,最后阐述己见。我们这里简要举几例。例如,陈亦挺、潘舒(2023)先解释高校英语教学跨文化能力培养内涵,再概述能力培养现状,最后跨文化能力培养策略[30]。李琼(2024)分析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跨文化交际实践能力的需求和跨文化能力研究现状,并建构了针对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跨文化交际实践能力模块,系统说明了培养途径[23]。

田野调查和模型建构多有尝试。田野调查在全部文献中占比很低,但是已有学者进行尝试,如高永晨(2016)、唐小波(2015)、黄晶、李镁(2012)、赵娟(2008)等等。国内学界还注重系统模型的建构,这一点在结构论的研究中尤为明显,代表性学者有杨盈、庄恩平(2007)、高永晨(2014)、顾晓乐(2017)等等。

4.2.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未至之境

当前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当前能够科学使用教育学、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的文章在全部文献中比例较低,不少研究都明显存在着过多的现象描述和浅层的经验反思现象,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此外,对于理论的引介和跨界,学界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理论的沿袭使得研究结论趋同,不少研究结论只是变换了前人的表述,结论的陈陈相因现象并不少见,创新意义十分有限。

第二,结构论研究遭遇瓶颈。当前对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结构学界已取得诸多共识,但是对不同对象的能力结构的特殊性研究不足。例如,国际中文教师承担汉语教学使命,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明显特殊性,例如其能力本质上为国际汉语教学服务,是专业能力的内在组成。再如,商务人士以商务交往为主要交际任务,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结构和高校学生的能力结构定有不同,应当如何对其进行科学描写和解释呢?当前结构论研究过于注重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类型对象的研究价值。

第三,许多培养对象亟待发掘。发展论和结构论逻辑上是顺承的,结构论研究的局限会在发展论上得到映射。正如前文所述,研究对象的单一化使得许多其他对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问题处于悬置状态。

第四,培养模式多元化任务任重道远。正如我们在前文总结的,要素建构模式等虽然科学,具有实践性,但是教育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过于依赖某几种培养模式往往产生惰性,最后制约了教育实践活动。此外,我们不能忽视现代教育技术带来的教育新质生产力,其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还能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31]。现在学界对新兴教育技术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结合问题的研究几乎空白。再如,教育新质生产力如何驱动培养模式发生变革,这一重大问题学界还没有进行比较充分的论证和回答。

第五,思辨和实证的关系失衡。当前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多为思辨性研究,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明显不足。许多结论都是构想、思辨和理论运动的产物,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是理论自发结出的无果实的花朵,甚至一些研究结论的实践性可行性究竟几何都是可能被怀疑的。此外,虽然一些研究已经开始突破了传统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如张卫东、杨莉(2012)、黄文红(2015)、高永晨(2016)等学者对多元研究方法进行的积极尝试,但是从总体来看,科学运用实证方法的相关文献还是比较少的。

4.3.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未来展望

扩展理论边界。这里我们简要列举几位学者的研究以说明何为扩张理论边界。李春光(2014)借鉴模因论,将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分为四个阶段,即同化阶段、记忆阶段、表达阶段和传播阶段[32]。李艳、张卫东(2013)论述了CDIO理念用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可行性,并建构了培养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模式[33]。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间从来都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而是不自足的。学科发展的本质特性是扩张性,很多研究理论都是相互贯通的。要敢于超越学科间理论间的藩篱和分野,推进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论的创新。例如,生涯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进程能否成为交际能力培养的营养?协同教育理论的系统论思维能否给予交际能力培养的些许启示?诸如此类,都能够成为理论扩展的潜在可能。正如刘勰所说:“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因

此, 超越理论限囿、深化理论基础、扩展理论视野是未来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必由之路。

发掘研究对象。前文提到,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以高校学生为主体。未来研究需要探究和阐释更多类型对象跨文化交际能力结构和培养模式的特殊性, 形成针对不同对象的培养体系。例如, 商务人士、外国来华留学生、航空人员、中小学生、职业院校学生和其他涉外人员都应该纳入研究范围, 他们之间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对象和环境都存在显著不同, 其能力培养体系的建构都需要深入研究。

把握时代语境, 总结交际实践和教学实践经验。这方面, 吴远青(2024)、易利、吴东英(202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为代表。他们直接将能力培养模式运用到课堂教学中, 并达到了良好效果。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 各国交往更加紧密, 跨文化交际更加频繁普遍, 未来研究要充分汲取不同交际实践的经验, 从中凝练结论, 形成理论, 更好回答什么样的能力要素才是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未来研究要深入能力培养实践一线, 树立高度的问题意识, 总结能力培养模式实践的经验。

实证和思辨良性互动。思辨和实证作为研究范式的两极, 并非此起彼伏消彼长, 而是辩证统一的。未来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应该更加受到重视。我们这里简要介绍几位学者的成果以为实例。钟华、白谦慧等(2013)构建了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 且具有较好的区分度、结构效度和信度[34]。高永晨(2016)运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量表, 对分布于全国 10 个省、市、自治区的 16 所高校的 2300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研测评,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提供了现实依据[35]。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实证主义色彩, 将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实证分析之上。未来研究要处理好思辨和实证的辩证关系, 加强田野调查, 实现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有机统一, 推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范式的转型。

5.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一项未竟的事业

实践创新永无止境, 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在这个意义上,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未完成性。本文回顾了三十年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学术史, 概述了该领域在能力结构内涵和能力培养策略上取得的理论成果, 并指出其在发展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局限, 强调理论边界的扩展、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时代语境的把握对于未来研究的重要意义, 比较全面客观地呈现当前国内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现实图景。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文本类型上未涉及专著和学位论文。事实上, 很多专著和学位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建设性的观点和论断。因此文本类型的偏狭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第二, 在文本总量上, 我们将来源类别限定在北大核心范围内, AMI 期刊和普刊上的文章并未纳入考察范围,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视野广度和论证深度; 第三, 受制于笔者的研究水平, 本文很多观点有待商榷, 有待提供更充分的证据以支撑论证过程。

参考文献

- [1] 杭国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法德语教学[J]. 外语界, 1994(4): 52-56.
- [2] 罗坤瑾, 张媛媛, 黎准. 中国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学术场域变迁考察——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2000-2019) [J]. 新闻大学, 2021(5): 22-39+121-122.
- [3] 闫伟娜. 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进展、热点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4, 35(2): 163-170.
- [4] 杨盈, 庄恩平. 构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J]. 外语界, 2007(4): 13-21+43.
- [5] 许力生. 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7): 17-21.
- [6] 刘学惠. 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 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 34-36.
- [7] 张卫东, 杨莉. 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的构建——基于外语教育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J]. 外语界, 2012(2): 8-16.
- [8] Canale, M. and Swain, M. (1980)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 1-47. <https://doi.org/10.1093/applin/i.1.1>

- [9] 高永晨.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价值与培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2): 17-19+34.
- [10] 顾晓乐. 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之理论和实践模型[J]. 外语界, 2017(1): 79-88.
- [11] Spitzberg, B. and Cupach, W. (198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Sage.
- [12] Kim, Y.Y. (2001)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age Publication, Inc.
- [13]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 外语界, 2013(6): 2-8.
- [14] 高永晨.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J]. 外语界, 2014(4): 80-88.
- [15] 袁靖. 构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的理论模型——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J]. 外语学刊, 2021(1): 74-78.
- [16] 颜静兰. 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口”与“补漏”[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3(1): 138-145.
- [17] 毛菊.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跨文化交际的内涵及培育[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7, 9(5): 66-72.
- [18] 任晓霏.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J]. 社会科学家, 2018(12): 146-151.
- [19] 杜秋枝. “一带一路”背景下领导干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提升[J]. 领导科学, 2019(14): 116-118.
- [20] 崔永华.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4): 25-36.
- [21] 柳超健. 商务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与培养途径研究[J]. 外语界, 2018(3): 10-17.
- [22] 贾梦姗.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多维研究[J]. 黑龙江畜牧兽医(下半月), 2016(12): 242-244.
- [23] 李琼.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跨文化交际实践能力培养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 2024(4): 30-34.
- [24] 沈洪木.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 37(18): 52-53.
- [25] 李智. 当代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建构与培养[J]. 江苏高教, 2014(5): 112-113.
- [26] 吕丽盼, 俞理明. 双向文化教学——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 中国外语, 2021, 18(4): 62-67.
- [27] 周广艺, 李清平. 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 湖湘论坛, 2018, 31(2): 137-143.
- [28] 张春海, 成丽宁.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院校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基本特征、时代呼声与实践模式[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 31(2): 155-160.
- [29] 顾晓乐. “第三空间”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实践探索[J]. 外语界, 2019(4): 67-75+96.
- [30] 陈亦挺, 潘妤. 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5(S2): 261-263.
- [31] 段海涛. 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 信息系统工程, 2024(9): 165-168.
- [32] 李春光. 模因论视角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探析[J]. 教育探索, 2014(1): 68-69.
- [33] 李艳, 张卫东. 基于CDIO教育理念的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6): 61-65.
- [34] 钟华, 白谦慧, 樊葳葳.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构建的先导研究[J]. 外语界, 2013(3): 47-56.
- [35] 高永晨.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2): 71-78+146.